

□ 饶鉴 刘晨宜 郭睿欣

从创猪宴“抄作业”的不同效果,看—— “展示”作为基层治理的一种引擎



吕德文

武汉大学
社会学教授

前不久,重庆合川“呆呆”创猪宴爆火以后,引来各地竞相模仿。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流量是一个稀缺品,关乎地方文旅发展。因此,每个地方都希望制造流量、利用流量,将偶然出现的流量视作“泼天的富贵”。但这个作业并不好“抄”,有的“抄”的效果挺好,有的因为组织不力,出现了“翻车”现象。

如何对乡村文旅流量进行冷思考,理解基层治理的逻辑变化?长久以来,基层习惯于以“不出事逻辑”来应对社会事务,但从文旅发展角度思考,基层需要从管控者变服务者,从“堵”到“疏”,从“怕出事”到“办好”事,这无疑也是基层治理迭代的重要时刻。

我们进入了一个展示性的社会 基层治理要用好“展示”这把双刃剑

地方政府对于流量的关注,源自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以及流媒体的兴起,中国社会可谓进入了展示性的社会。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如今这样,人们通过自拍、短视频等方式,将个体的日常生活展示给熟悉或陌生的观众。因此,人们都生活在透明的社会中,那些曾经是自娱自乐的甚至是隐私的东西,往往会成为网络狂欢的对象。“展示”是一把双刃剑,它拒绝一切延迟、回避以及掩盖,私人生活被凝视,制造个体的不安全感;但它也带来了关注,一个人、一个地方因意外而拥有流量,这往往是难得的获得展示,继而转化为发展机会的契机。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流量已经是基层治理的一个常量,它有没有、多和少,都在客观上通过展示的逻辑,影响着基层治理生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层政府需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化解纠纷,避免矛盾纠纷外溢,“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差不多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准则。而在展示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在自媒体中表达情感、评论事件。甚至于,自媒体代替了传统的信访和热线,成为了监督渠道。因此,无论是小事还是大事,好事还是坏事,都容易在第一时间溢出乡村。这些事件一旦点燃流量的逻辑,会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互联网公共事件。

如果说,传统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是通过利益表达渠道的规范化,以及纠纷处置的制度化,最大限度地减少一些事件的影响,使得基层政府能够通过渠道的控制、处置方式的尺度,来平衡各方利益,让基层政府成为裁判者的话,那么,在展示社会中,普通民众和基层政府会越来越平等,在一些情况下,因为个体具备“网红”的气质,反而占据优势。这种变化,预示着基层治理逻辑必定会改变。

一些地方及时转变了思维,拥抱展示社会,通过快速反应、有效引导,将流量转化为地方发展的积极因素,让流量赋能基层治理。比如,景德镇的“鸡排哥”,合川的“呆呆”创猪宴,均是如此。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一些地方干部主动做起了“网红”,为本地旅游业和农副产品代言,取得了良好效果。此类转变,应该鼓励,而不是限制。尽管有些地方因为不专业,措施不完善,效果不佳,但这符合流量逻辑,不可苛求。

当然,展示社会容易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产生联系。少数地方干部热衷于搞形象工程,通过制造流量,产生了更大的负面效果。近年来,一些地方的文旅项目因为刻意追求夸张效果,不顾实际,造成了国有资产损失,也引起了民怨,这是值得重视的教训。但是,板子不应该打在流量逻辑上,需要反思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逻辑下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基层”的范畴发生了改变 “网络田野”和田间地头一样重要

展示社会对基层治理最重要的重塑是,“官民共治”成为了基层治理的基本原则。在展示社会中,一个地方要向外界树立好形象,要吸引流量,仅仅依靠传统的、单向度的宣传,已经不合时宜。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日常的细节,能够共情的故事,这都需要普通民众的参与。

从典型案例看,那些成功吸引流量的城市,无不是利用了普通网红不经意间流量,将政府的另一面展示出来,从而制造好感。重庆合川“呆呆”创猪宴吸引了大批游客后,当地政府迅速行动,通过跨部门协调,将地方的风俗民情以及服务型政府的良好形象展示出来。这种做法,既缓解了“呆呆”个人的压力,又收获了口碑。景德镇的“鸡排哥”一夜爆红之后,地方政府做的不是“堵”,而是积极引导,办好,从而将城市管理的一面展示出来。可见,一个富有有人情味和烟火味的城市,恰恰是能够吸引人的品质。

“呆呆”和“鸡排哥”这样的普通人,能够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宾,预示着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个新命题。长期以来,党和政府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方法,其要点主要有二:一是基层治理的主要工作方法是群众路线,基层工作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工作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基层工作的特征是面对面的第一线工作,领导干部不能坐在办公室完成任务,需要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过去,基层往往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如驻村、信访接待、帮扶联系等方式,来开展面对面的群众工作。在展示社会中,谁是群众,谁是“关键少数”,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按照传统的群众工作方法,“呆呆”是一个未婚女孩,在村庄里可能很难成为群众的代表,在大多数情况下,她的父母可能“代表”了她;但在网上群众工作中,“呆呆”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她才是需要密切联系的群众代表,才是影响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少数。

在这个意义上,“基层”的范畴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网络田野”和田间地头一样重要,穿着“马甲”的网民也是群众的一分子。基层工作的场域,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还在网络社群里。让人惊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也在触网,他们将工作日志写在了自媒体上,将为民服务、纠纷调解等工作展示出来。这在无形中密切了党群关系。

展示社会是一个透明社会,对于个体而言,“透明”可能是一种干扰,会对日常生活带来困扰;但对政府而言,透明则是政务公开的自然逻辑,是主动接受监督、增加群众对党和政府信任的有效措

施。在展示社会中,基层政府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倾向于通过更加高效、便捷的方式,主动向社会展示其工作,这其实是高效能治理以及高质量民主的表现。概言之,当基层政府不再将政策信息差以及解释权当作其治理策略的基础时,基层治理必定更加依靠法律制度,其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会得到极大程度提高。

“平台化治理”模式 正在塑造新的基层治理生态

展示社会还可能预示着,一种可称之为“平台化治理”的模式,开始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在传统的基层治理中,基层治理主要是针对具体事件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做群众工作来达成治理效果。尽管各个治理事务客观上具有内在联系,但人们倾向于通过职责分工的方式,进行分类处理;尽管群众是一个整体,但人们也倾向于把群众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然而,在展示社会中,事务的连带性更加复杂,事务的性质难以划分;群众也难以通过传统的社会关系进行分类。客观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事务,都在某一个事件中汇集起来。因此,基层的高效能治理,往往不在于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而是通过搭建平台,将各类事务进行集成化处理。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尝试通过文旅特色项目来搭建平台。一个网红打卡点,一个网红赛事,一个网红文娱节目,乃至一个看似偶然的网红事件,看似是一个文旅产品,但地方政府乃至当地社会,却可以将其平台化,既服务于经济发展,也服务于社会治理。比如,贵州的村BA、村超、村T等文旅项目,是典型的平台化治理的产物。一个遥远的偏僻山区,却因为网红项目而聚集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巨大的流量可谓是弥补了自然地理的隔离,市场的可及性迅速绕开了自然地理屏障,在互联网经济中获得了优势地位。

村字头的文体项目,本是当地居民自娱自乐的文体活动,其意义也主要是丰富群众性文化生活。但自从其获得了展示机会后,他们已经成了吸引游客、售卖农产品以及进行乡风文明建设的引擎。可以说,“展示”成了基层治理的引擎,它在塑造一个全新的基层治理生态。在这个生态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具有展示价值,他们的每一次有意无意的展示,在给自己带来流量和市场机会的同时,也在反馈给地方,让地方IP更具活跃度。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地方的风土人情与社会治理,也被深深绑定。只有当每一个人都激发了潜能,具有主人翁的意识,才能将地方上的公共IP擦亮。同样,只有公共IP具备足够的展示度,能够吸引足够的流量,才能为个体发展提供平台。

当前,展示社会已然是一个社会事实,基层治理虽然面临挑战,但意味着更大的机遇。如果主动地将“展示”当作基层治理的引擎,那就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更加高质量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用五个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意蕴深刻,引人深思。“五个突出特性”是理解中华文明精髓的钥匙,更是指导文化遗产活化实践的纲领。

“五个突出特性”贯穿文化遗产活化的本质要求

文化遗产活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深刻把握并自觉运用“五个突出特性”的内在要求,将其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尺。

以“连续性”为基,守护文明根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连续性要求文化遗产活化必须尊重历史真实性和风貌完整性,反对割裂文脉、破坏载体的短期行为。活化工作要强化系统性保护与整体性传承,通过绘制“文明传承谱系图”、建立数字化档案库等方式,夯实连续性的根基。北京中轴线对城市格局的整体管控,苏州古城“整体保护、活态传承”的模式,都是维护连续性的有益探索。

以“创新性”为径,激发时代活力。创新性为连续性注入不竭动力。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融入现代生活,这就要求超越仿古复刻的表层模式,鼓励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圳南头古城“设计介入+内容运营”的更新路径,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的沉浸式体验,展现了创造性转化的巨大潜力。

以“统一性”为魂,凝聚国家认同。统一性是中华文明在空间维度展现的强大凝聚力。文化遗产活化应强化这一国家叙事,打破行政区划和部门壁垒,整合线性遗产、文化线路,共同讲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统一发展的宏大故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正是通过跨区域协同,强化国家文化认同的典范。

以“包容性”为要,促进社会共享。文化遗产是全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提升包容性,就是在活化过程中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保障社区、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成都宽窄巷子探索商居平衡,泉州世界遗产地推动社区共建,体现了对包容性的追求。

以“和平性”为桥,深化文明互鉴。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和谐、和睦的价值理念。彰显和平性,就是要将其作为促进国际理解、友好交流的纽带,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要着力避免在商业开发和展示中,文化遗产蕴含的“和合”等哲学思想被娱乐化、浅薄化处理,应加强深度阐释,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违背“五个突出特性”容易使文化遗产活化陷入误区

当前,各地推动文化遗产活化的积极性很高,但也出现一些值得警惕的倾向,根源在于对“五个突出特性”的理解和落实出现偏差。

重“形”轻“魂”,连续性受损。有的项目热衷于建仿古街区、搞形象工程,却忽视对历史文献的挖掘,对传统工艺的传承,导致文化遗产只剩下空洞的外壳,文明记忆的连续性被割裂。

盲目跟风,创新性异化。不同城市资源条件各异,但一些地方不顾本地文化特质,简单复制“网红”模式,一窝蜂搞沉浸式剧场、灯光秀,结果业态雷同,缺乏持久吸引力,造成资源浪费。

画地为牢,统一性弱化。跨区域的文化遗产本应整体保护利用,但一些地方受行政区划分割,各自为政,缺乏协同机制,难以形成国家层面的文化标识和叙事合力。

主体缺位,包容性不足。部分项目由政府或资本主导,社区和原住民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活化的社会效益未能有效反哺当地民众,甚至因搬迁、商业化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内涵淡化,和平性遮蔽。在国际传播中,有时过于注重形式展示,对文化遗产蕴含的“和合”等哲学思想阐释不足,难以达到深度交流互鉴的效果。

构建“五位一体”的文化遗产活化方法论

推动文化遗产活化走深走实,必须以“五个突出特性”为引领,并依据其内在逻辑,构建系统、科学的“五位一体”方法论。

遵循“连续性”特性,坚守守正原则,夯实历史价值根基。在全面普查、建立数字化档案库的基础上,对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进行系统性评估与记录。任何活化利用都必须在严格保护历史信息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框架内进行,确保文明传承不断、不走样。这是方法论的基础和底线。

激活“创新性”特性,运用转译原则,提升艺术转化率。创新性为文化遗产注入时代生命力。这要求我们善用转译原则,即不是简单复制,而是运用当代审美、新技术、新媒体对文化遗产的内涵进行创造性表达。其成效关键在于艺术转化率,即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以多高的接受度和吸引力转化为符合当代需求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如深圳南头古城的设计再造、西安“长安十二时辰”的沉浸式体验,均是成功转译的范例。

强化“统一性”特性,贯彻整理原则,凸显本体价值。统一性强调文化遗产作为国家民族认同载体的整体性。这要求贯彻整理原则,即打破行政区划和部门壁垒,对跨区域、跨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整合与主题提炼,形成统一的国家叙事。其目标是最大化彰显文化遗产的本体价值,即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象征的根本意义,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正是通过系统性整理,强化了其作为国家文化标识的本体价值。

提升“包容性”特性,践行共生理念,优化主体协同。包容性要求活化过程必须汇聚各方力量。这需要践行共生原则,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互利共赢的治理格局。其成效直接体现为主体协同的水平,即通过建立有效的协商平台和利益共享机制,确保社区、民众等不仅是旁观者,更是参与者、受益者,形成文化遗产与社区发展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

彰显“和平性”特性,落实共享原则,放大数字赋能系数。和平性蕴含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的理念。这要求落实共享原则,借助数字技术打破时空限制,将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和平价值以更便捷、更生动的方式在国内国际共享。其效能可通过数字赋能系数来衡量,即数字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拓展了文化遗产的传播范围、深化了其价值阐释、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从而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的公共资源。(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五个突出特性』里有文化遗产活化的方法论

扩大职业教育“朋友圈”

□ 彭怀学 张汉敏

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加强标准引领、品牌塑造,提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水平,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全面提升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服务产业发展的关键载体,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是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把握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内涵。

从价值内核上看,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价值追求,贯穿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全过程,推动构建基于平等互信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格局,使职业教育成为传递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载体。

从实践逻辑上看,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是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实践方向。其核心要义在于推动职业教育跳出单向“走出去”或“引进来”的传统模式,构建“走出去”与“引进来”双向赋能的协同发展机制,涵盖技术共享、人才共育、标准共建等多元内容,实现中外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

从发展目标上看,将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纳入全球发展框架,通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助力各国产业升级,有利于缩小发展差距,

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人才支撑。

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目标可分为三个层次。

短期目标聚焦基础能力建设,核心是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适配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基础框架。具体而言,应明确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建立初步的国际合作质量标准;依托鲁班工坊等现有平台,扩大在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职业教育影响力;推进技能认证国际化进程,实现部分优势专业与国际认证体系的对接。

中期目标侧重于体系完善,关键是形成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协同治理体系。在区域布局上,发挥东部沿海桥头堡作用,带动中西部职业教育协同“走出去”;在机制建设上,构建教育、财政、产业等多部门协同保障机制,形成“产教融合,教随产出”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在内容建设上,实现专业标准、课程资源、教学成果的国际转化与共享,推进标志性学历教育项目的国际化拓展。

长期目标指向价值引领与全球贡献,核心是打造职业教育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典范。通过构建成熟的职业教育国际标准体系与评价体系,为全球职业教育合作提供中国方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职教品牌,使中国职业教育经验成为全球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参考;推动职业教育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彰

显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

立足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现实需求,需从战略布局、行为规范、项目创新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完备的实施方案。

优化战略布局,构建服务全球发展的职教合作网络。战略布局的优化要紧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与引领方向,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合作格局。一是服务新型大国外交需求,升级鲁班工坊等国家级平台。二是对接产业国际布局,推进技能认证国际化。主动融入国际认证体系,聚焦智能制造、新能源等优势专业,联合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开发具有国际通用性的技能标准与认证规范,培育适应全球产业链需求的通用型人才。三是强化区域与部门协同,形成发展合力。发挥东部沿海职业教育资源优势,通过结对帮扶、联合办学等方式带动中西部院校提升对外开放能力;统筹教育、财政、外事等部门资源,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为职教国际合作提供政策、资金与安全保障。

规范开放行为,建立共商共建的协同治理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为指引,规范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行为。一是构建协同出海模式。秉持“产教融合,教随产出”理念,建立行业协会牵头、职业院校主力、企业参与的协同机制,明确各方权责,避免无序竞争。行业协会负责市场调研与标准对接,职业院校承担人才培养与课程开发,企业提供实践岗位与技术支持,

形成优势互补的利益共同体。二是推进数字化赋能转型。顺应全球职业教育数字化趋势,利用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技术,建设国际化在线课程资源库,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全球共享;开展师生数字化素养培训,提升跨文化交流与远程教学能力,增强学生的国际就业竞争力。三是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由中外专家共同组成的质量评估委员会,以共商共建的方式制定国际合作质量标准;引入大数据技术,对合作项目的教学过程、人才培养质量进行全程跟踪与动态调整,确保合作成效。

创新项目载体,实现多元协同的合作共赢。项目载体的创新需体现开放包容理念,实现内容、形式、目标的多元化发展。在内容上,突破单一技能培训的局限,构建涵盖技术输出、人才培养、标准规范、科研成果转化的多元内容体系,特别关注绿色技能、数字技能等全球紧缺领域的合作,对接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形式上,在现有培训项目基础上,推进本科层次学历教育项目的国际化,拓展国际论坛、师生游学、海外实习基地等合作形式;开展诸如“职业技能+中文”的特色培训,满足中外企业海外发展与当地产业需求。在目标上,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双向发力,既积极推广我国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也主动引进国际先进模式,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我国职业教育质量。(作者单位:武汉市职业院校党委宣传部、科研处)